KHARISMA: JURNAL ILMIAH TEOLOGI
Vol. 7, No. 2 (2026): 79–91 ISSN: 2722-6441 (online), 2722-6433 (print)
Diterbitkan: Sekolah Tinggi Teologi Kharisma, Bandung http://jurnalsttkharisma.ac.id/index.php/Kharis/

诗篇作为“歌唱的第二托拉”：对祷告、哀歌与赞美的正典进路

Wilda Prianty Simanjuntak[1], Christon Nababan[2]
Sekolah Tinggi Teologi HKBP Pematangsiantar
wilda17simanjuntak@gmail.com[1], christonnababan@gmail.com[2]

摘要
诗篇常被称为“歌唱的第二托拉”，以全面的方式涵盖祷告、哀歌与赞美。本研究以正典进路考察诗篇作为歌唱的第二托拉这一神学概念及其对祷告、哀歌与赞美的表达。研究采用质性文献研究法，借助布雷瓦德·S·蔡尔兹（Brevard S. Childs）的正典诠释学，以终极形式阅读诗篇，对神学文献与希伯来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诗篇与托拉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编修过程，大卫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诗篇40篇在感恩与祈求之间转换，显示信仰是动态而循环的；诗篇150篇则是全面赞美的高潮。在神学上，诗篇引导神的子民走向统一的信仰，并指向神国的末世盼望。

关键词：诗篇；第二托拉；正典进路；祷告；哀歌；赞美

引言

诗篇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它不仅在旧约正典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深刻影响了教会的灵性与礼仪。诗篇包含向神所献的祷告、赞美、喜乐的表达与灵魂的歌唱。[1]它涵盖了从赞美、哀歌、认罪到对神的盼望等广泛的信仰表达，因而深受读者关注。[2]尽管声名远播，诗篇仍令人费解，因为许多诗篇带有个人性质，缺乏明确的历史背景或传承过程。另一方面，诗篇中的许多意涵指向积极的层面，例如诗篇23:1带有安慰的意味，因为这节经文似乎表明，主是生命与安慰的源头，带来救恩的确据与安稳。

如今，许多会众在崇拜与个人祷告中越来越少完整地使用诗篇。教会往往只选取诗篇中带有安慰或赞美性质的经文，而令人不安的哀歌则常被回避。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哀歌与积极的或以得胜为导向的礼仪不相称。讲道者也常常回避哀歌诗篇，因为它们比安慰诗篇更难诠释。结果，哀歌诗篇不再被宣讲，尽管会众需要它们，因为真实的信仰正是在哀歌中受到考验。[3]“诗篇是歌唱的第二托拉”这一理解在普通平信徒中

[1]Dietrich Bonhoeffer, *Psalms: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1st ed, with Walter Brueggemann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2022), 27.

[2]Tremper Longman dan Raymond Bryan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 ed (Zondervan, 2007).

[3]J. Blommendaal dan P. S. Naipospos, *Pengantar kepada perjanjian lama*, Cet. ke-2 (Gunung Mulia, 1983), 11.

大多不为人知，而诗篇恰恰是一部收录了子民祷告与诗歌合集的书卷。当教会将喜乐置于哀歌之上时，便会产生一种肤浅的信仰，不愿从苦难中学习，因此有必要进行如本研究所做的概念性探究。

诗篇在整本圣经中章数最多，对基督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礼仪与个人灵性方面，塑造着教会的生活。[4]诗篇以歌曲或诗歌体的赞美为主作见证，荣耀神。希腊文称之为*Psalmoi*（ψαλμοί），希伯来文称之为*mizmor*（מִזְמוֹר）。[5]这两个词都指在崇拜中向主献上的歌曲，甚至指弦乐器。也许正因如此，阅读诗篇犹如歌唱，因为这卷书的本质就是一首歌。

当今教会中歌唱诗篇的实践令人关切。韦伯（Webb，2023）在其博士论文中发现，福音派教会中的诗篇歌唱正在逐渐消失，原因是会众参与度降低，对诗篇的理解也较为欠缺。[6]与此相对，扬科维茨与克鲁格（Jankowitz and Kruger，2010）发现，教会经历了一次诗歌本的改革，而会众实际上从未用该诗歌本歌唱。他们发现南非教会正处于改革之中。[7]未能引入新歌，使诗篇歌唱的传统面临消亡的危险。这进一步印证了诗篇歌唱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并广泛存在于众多宗派之中。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试图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诗篇为被歌唱的第二托拉？祷告、哀歌与赞美如何塑造诗篇的神学结构？这一理解对神子民的信仰生活具有哪些神学与礼仪上的意涵？期望通过正典进路回答这三个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为文献研究法（*library research*）。质性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来探究问题的意义，而非通过统计或量化。选择质性方法，是因为本研究旨在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诗篇作为第二托拉的概念，因为诗篇包含祷告、哀歌与赞美这些全面或普世的要素。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是希伯来文诗篇文本（《斯图加特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及印尼文译本（TB II，LAI，即印尼圣经公会《新译本第二版》）。研究重点是诗篇40篇与150篇。选择诗篇40篇，是因为这一篇明确显示了双重结构，即第1–10节的感恩，以及第11–17节的哀歌或祈求，二者同在一篇诗中。诗篇40篇能够代表信仰的动态并非线性。选择诗篇150篇，是因为它是整部诗篇的高潮，“赞

[4]Blommendaal dan Naipospos, *Pengantar kepada perjanjian lama*.

[5]Angelika Berlejung 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1 ed., 1 (BPK Gunung Mulia, 2017); *Perjanjian Lama: Ibrani - Indonesia* (Lembaga Alkitab Indonesia, 2004).

[6]Philip Webb, “A DEFENSE OF PSALM SINGING: SOLUTIONS TO CONTEMPORARY PRACTIC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ies, 2023), https://doi.org/10.13023/ETD.2023.354.

[7]Hendrika J. Jankowitz dan Daleen Kruger, “Die stand van psalmsang in die NG Kerk,” *Verbum et Ecclesia* 31, no. 1 (2010): 7–10, https://doi.org/10.4102/ve.v31i1.400.

美”（*Halelu*）这一命令重复了10次，成为向“凡有气息的”发出的普世呼召，代表着赞美神学的顶点。次要资料包括从正典进路探讨诗篇以及祷告、哀歌与赞美的书籍、国内外期刊和博士论文。所用的主要著作是布雷瓦德·S·蔡尔兹的《作为圣经的旧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和杰拉尔德·H·威尔逊（Gerald H. Wilson）的《诗篇的结构》（*The Shape of the Book of Psalms*）。

分析依照蔡尔兹所发展的正典诠释学规则，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分析正典文本的终极形式，即诗篇40篇与150篇，在阅读时采用其终极形式，而不预先区分资料来源或编修层次。同时辨识每篇诗的宏观结构，首先是经节的划分，以及诗篇40篇由感恩转向哀歌、诗篇150篇转向普世赞美时体裁的变化。整部诗篇内部的上下文关系也在分析之列，即将诗篇40篇置于第一卷（诗篇1–41篇），将诗篇150篇置于第五卷（诗篇107–150篇）的结尾。研究追溯诗篇40篇中的个人祷告或哀歌如何与诗篇150篇中的群体赞美相联系，以及诗篇的五个部分如何构成由哀歌通向末世赞美的神学轨迹。

神学分析关注正典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终极形式的文本对信仰群体教导了什么？”对于诗篇40篇：感恩与哀歌的结构如何塑造一种在神面前动态而诚实的信仰模式？对于诗篇150篇：“全然的赞美如何成为一切祷告与哀歌的最终目标？”综合与引申意涵的工作，则是通过比较诗篇40篇与150篇的分析结果与歌唱的“第二托拉”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随后，研究为当今教会引申出神学与礼仪上的意涵，尤其涉及完整地运用哀歌与赞美。数据的效度通过对资料来源的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即比较多位学者的观点，以及通过诠释学（*hermeneutical*）上的一致性获得，即每一项神学主张都必须以对希伯来文本终极形式的分析为根据，而不是以假设性的历史重构为根据。通过这一程序，本研究不仅声称采用了正典进路，而且展示了将其应用于诗篇40篇与150篇文本的具体步骤，使读者能够理解本文。

讨论

诗篇作为正典书卷与第二托拉

与圣经中的其他书卷相比，诗篇是最受喜爱的书卷之一。[8]这是因为诗篇通过言语表达对神的思想。[9]诗篇的大部分内容以诗歌体写成，一般认为是希伯来诗歌。诗篇本身是旧约的第三部分，包含诗歌体与历史性的语句，大体上源于巴比伦时期或被掳时期，因而属于希伯来旧约的最后一个部分，通常称为“*Ketubim*”，意即“圣卷”。[10]

[8]Longman dan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63–65.

[9]Paulus Subiyanto dkk., “Conceptualization of God in the Book of Psalm: A Study of Metaphor 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s Research* 5, no. 1 (2019): 46, https://doi.org/10.5296/elr.v5i1.14594.

[10]*The Writings: = Ketuvim*,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According to the Masoretic Text, 3rd section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2), 107–18.

正典理论同样由蔡尔兹阐述。他在《作为圣经的旧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一书中主张，正典进路的引入是对圣经的一种理解形式。[11]这一进路批评历史批判法的主导地位，认为后者过分强调文本的起源。与此相反，蔡尔兹强调作为正典的文本终极形式的神学意义，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圣经。诠释的重心由历史转向文本如今如何被信仰群体所接受。在此意义上，正典不仅被理解为书卷的汇集，更被理解为一个神学价值的框架，其意义在整体中显明，因为从整体来看，它产生了重要的神学功能。考虑历史背景来理解圣经经文，并未因此被忽视；相反，它被用作辅助工具，而非诠释的中心。

“歌唱的第二托拉”这一表述是对诗篇的神学称谓，因为其终极形式像五经一样由五个部分组成。然而，它的指引并非通过叙事—律法式的律例，而是通过祷告、哀歌、赞美与信仰的默想。诗篇是旧约学者编订的，并非随意呈现的歌曲汇编，而是有特定目的的编排，并像托拉（摩西五经）一样分为五卷。[12]五经包含五卷书，是长期编订过程的结果，因而诗篇也有了五个部分，这被理解为一种旨在描绘托拉结构的编修形式，使诗篇看起来像第二托拉。诗篇不仅是歌曲或祷告的汇集，更是塑造灵性、教导信徒在神面前生活的文本。诗篇常被比作祷告形式的托拉。如果托拉是生活的准则，那么诗篇就是祷告的方式，是在主里祷告和经历生命的范式。诗篇有着并非随意的终极形式，因为它是出于神学目的而编排的，其中包含了从大卫王在神面前走向作王的真神的信仰故事。诗篇论及我们如何理解苦难、盼望与祷告，这使诗篇类似于引导生活的托拉。[13]

词根*Mizmor*（מִזְמוֹר）表明，真正的信仰不是冰冷的教义，而是被歌唱的祷告。[14]音乐与诗歌是倾诉人与神之间动态关系的恰当媒介。有57篇诗篇在其标题中使用了*Mizmor*（מִזְמוֹר）一词，这一一致的用法构成一种礼仪符码，表明这些诗篇是为在团体敬拜中演唱而创作的。*Sefer Tehillim*源于词根הלל（*halal*），其名词形式为*tehillah*（תְּהִלָּה）。[15]其意为赞美、颂赞、荣耀与辉煌。词根*halal*衍生出“哈利路亚”一词，这是对神的子民发出的赞美耶和华的呼召，因此它是行动的号召，而不仅仅是对内容的描述。*Psalmoi*（ψαλμοί）是希腊文形式，据七十士译本（LXX）所示，这是约公元前200

[11]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1st American ed (Fortress Press, 1979).

kra[12] Isak Petrus Puling dkk., “Mazmur sebagai Doa dan Pujian: Tafsir Teologis terhadap Dinamika Emosi dalam Kitab Mazmur 146-150,” *Jurnal Riset Rumpun Agama dan Filsafat* 4, no. 2 (2025): 132–45, https://doi.org/10.55606/jurrafi.v4i2.5083.

[13]Gerald H. Wilson, “The Shape of the Book of Psalms,”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46, no. 2 (1992): 129–42, https://doi.org/10.1177/002096439204600203.

[14]Philippus J. Botha, “Interpreting ‘Torah’ in Psalm 1 in the light of Psalm 119,”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68, no. 1 (2012): 7 pages, https://doi.org/10.4102/hts.v68i1.1274.

[15]*Perjanjian Lama*.

年前后由希伯来文译为希腊文的结果，将Mizmor译为Psalmoi，意为拨弄、弹奏弦乐器。[16]

《诗篇》的作者问题，常常被归于大卫，他被视为诗篇的作者，同时也被看作诗人。大卫之名出现73次，所罗门2次，摩西仅1次，亚萨12次，可拉的子孙11次，以探与希曼各1次。[17]《诗篇》并非仅由大卫一人所写，尽管他的名字出现了73次。有一种论点认为，后来的编修者添加了归于大卫的署名。大卫被标示为73篇诗篇的作者，例如诗篇15篇；摩西被标示为诗篇90篇的作者；所罗门被标示为诗篇72篇与127篇的作者。在希伯来圣经之外，七十士译本的一些抄本还提到其他作者；希伯来圣经中有13篇诗篇、七十士译本中有16篇诗篇提供了额外的信息，说明相关诗篇被认为产生于大卫生平中的哪些处境。[18]

另一种观点认为，《诗篇》是古代以色列群体逐步形成的一部汇集，因此大卫更像是神学传统中的一个人物，而非唯一的作者。[19]事实上，该书似乎是从东方的视角呈现《诗篇》的形状与形成过程，正如“*The shape of the Psalter: author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所表达的那样，该标题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译作“Bentuk Kitab Mazmur: Kepengarangan di Timur dekat Kuno”（《诗篇的形状：古代近东的作者问题》）。近期研究对大卫写成《诗篇》表示怀疑，因为历史传统是由编修者或编辑者添加的，而这一过程发生在《诗篇》的传抄过程中。[20]一些学者对作者问题表示不确定，这一点同样已被指出。归根结底，《诗篇》的作者问题难以直接证实；圣经传统遵循大卫为主要作者的信念，尽管历史证据并不确定。《诗篇》并非出自单一作者；毋宁说，人们相信大卫是主要的作者，可以说他居于《诗篇》的中心，而《诗篇》乃是不同时期的多位作者通过正典化过程汇编而成的结果。[21]因此，《诗篇》作为一部正典产物，被描述为由多位作者汇集而成、以写作最多的大卫为中心人物，并非一人之作。

就成书年代而言，《诗篇》分为三个部分或三个时期：*Praexilic*（被掳前）、*Exilic*（被掳期）与*Postexilic*（被掳后）。例如，诗篇29篇是被掳前的诗篇，被掳期的诗篇是诗篇137篇，被掳后的诗篇是诗篇150篇。这是断定《诗篇》年代即写作时间的依据，人们相信《诗篇》写成于被掳前、被掳期与被掳后三个时期。《诗篇》据信在公元前100年之前写成或完成。其编成据信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约1000年，经由一个历

[16]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17]Blommendaal dan Naipospos, *Pengantar kepada perjanjian lama*.

[18]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19]Nancy L. DeClaissé-Walford, *Introduction to the Psalms: a song from ancient Israel* (Chalice Press, 2004).

[20]Longman and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1]Longman dan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史过程，因而这部书据信写成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22]按照传统，诗篇90篇与摩西相关联，而许多其他诗篇则与大卫、亚萨、可拉的子孙，乃至所罗门相关联。从学术角度看，诗篇被理解为一个长期修订的汇编过程，始于被掳前时期，经过被掳期，直至被掳后时期。同样，以色列在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黄金时代发生于公元前10世纪，涉及《诗篇》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大卫写了73篇诗篇，所罗门的诗篇是诗篇72篇与127篇。亚萨、可拉以及哀歌的作者写了12篇诗篇，据信其年代为公元前10世纪至6世纪。这一点由在巴比伦被掳的时期所印证。[23]

《诗篇》的最后部分由被认为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甚至被说成可晚至公元前100年的诗篇组成，据信是在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时代编成的。[24]这一时期以诗篇137篇为标志，该篇清楚地叙述了发生于公元前586–538年的巴比伦被掳，因为它描绘了犹太人在被掳期间所经历的苦难，例如诗篇137:1。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25]

这表明《诗篇》的写成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除了诗篇137篇的写作之外，还有其他特征表明这发生在被掳后时期，即出现了晚期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例如关系代词*“še”*（שׁ），它成为*“’ăšer”*（אֲשֶׁר）的基本形式，见于诗篇122–144篇。[26]这是一种语法上的差异，表明《诗篇》的写作时间源于波斯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

《诗篇》与摩西五经几乎相同。《诗篇》同样由五卷组成。《诗篇》第一卷包括诗篇1–41篇，其本身又由两部分组成，即称为妥拉的第一序言，以及仅由一篇诗篇构成的第一序言，也就是诗篇1篇。随后是第二序言，其中包含关于弥赛亚的大卫诗篇，见于诗篇2–41篇。第二部分，即诗篇42–72篇，常被称为*Elohistic*（伊罗欣典）诗篇，因为它们基本上使用*Elohim*（伊罗欣）一词。这一卷分为若干部分，即诗篇42–49篇为可拉子孙的诗篇，诗篇50篇为亚萨的诗篇，诗篇51–71篇为大卫的诗篇，诗篇70–83篇再次为亚萨的诗篇，诗篇72篇特别是所罗门的诗篇，最后诗篇89篇为以探的诗篇。[27]至少，《诗篇》分为五个部分，这是经过两千年的探究所得出的结论，即诗篇1–

[22]J. Alberto Soggi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Closing of the Alexandrian Canon*, Rev. ed,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Westminster Press, 1980).

[23]Bruce K. Waltke, *The Psalms as Christian lamen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24]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25]*Perjanjian Lama*.

[26]*Perjanjian Lama*; Avi Hurvitz dkk., *A concise lexicon of late biblical Hebrew: linguistic innova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Supplements to Vetus Testamentum, volume 160 (Brill, 2014).

[27]W. S. Lasor dkk., *Pengantar Perjanjian Lama 2*, vol. 13, 13 10002011999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13 ed., BPK Gunung Mulia, 2011).

41篇；42–72篇；73–89篇；90–106篇；以及107–150篇。[28]许多意见认为，《诗篇》与妥拉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篇章数目上差别不大，《诗篇》有150篇，而妥拉有153章。

《诗篇》的第三部分，即诗篇90–106篇，由对作为君王的יהוה（*Adonai*）的赞美组成，这些诗篇也包括各种类型的诗篇，始于摩西的诗篇，诗篇92篇为安息日诗篇，诗篇92篇为感恩祭诗篇（Todah），诗篇100篇，以及大卫的诗篇，即诗篇101篇与103篇。第四部分，即诗篇120–134篇，由"*Ma'alot*"（"上行之诗"）的诗篇组成，这些诗篇也被称为朝圣诗篇，甚至被称为大卫的诗篇。在《诗篇》的第五部分，即诗篇138–145篇，是大卫的诗篇，随后是诗篇149篇，据说是由*Messianic*（弥赛亚）子民所唱的第一篇结语，最后是诗篇150篇中以"赞美神"为形式的第二篇结语。[29]这两部书之间略有差异。这是因为差异并不在于其基本结构，而在于对权威、标题、写作时间以及编修者的编修过程之解释所持的不同视角。在这部书每一部分的末尾，总有一句结语，如诗篇41:14所宣告的"阿们，阿们"。许多诗篇带有标题，总是在第一节；所有这些标题都可以确切地追溯为后来的添加。上标是指写得比正文更小、位置稍高的文字、数字或符号。

诗篇作为神的子民的祷告

罗伯特·D·米勒二世（Robert D. Miller II）在《*The Psalms as Israel's Prayer and Our Own*》中主张，《诗篇》是以色列民的祷告，不仅仅是一部带有宗教主题的诗歌集，而是活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中的祷告表达之媒介。[30]《诗篇》所载的经文被广泛用于敬拜，因为《诗篇》被视为塑造灵性的媒介，为会众在祷告中所用。守护传统价值的教会发现，诗篇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祷告。纵观其历史，诗篇一直被理解为一部祷告之书，因为它描绘了神的子民中信仰与宗教实践的动态。《诗篇》以两种方式或两种方法传达，即集体（团体）的与个人（个体）的，正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31]可称为双重框架者，连同涵盖整部《诗篇》（诗篇1–150篇）、由妥拉直至普世赞美的外部框架，乃是一种颂赞，换言之，是赞美神的指南。[32]这一点得到诗篇146–150篇所含赞美之高潮的支持，[33]这似乎表明，结尾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迈向对神赞美的顶峰。《诗

[28]Lasor dkk., *Pengantar Perjanjian Lama 2*, vol. 13.

[29]Blommendaal dan Naipospos, *Pengantar kepada perjanjian lama*; 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30]Robert D. Miller, *The psalms as Israel's prayer and our own*, Christian heritage rediscovered 2 (Christian World Imprints, 2013).

[31]Longman dan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32]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33]Puling dkk., "Mazmur sebagai Doa dan Pujian."

篇》本身分为五个部分，分别终止于41、72、89、106与150篇，每一部分都以颂赞作结，因此它也被描述为一部仿效妥拉的书，是一条出自哀歌的轨迹。[34]

《诗篇》的最终形式包含非常广阔的空间，犹如默想与个人祷告。这可由约35至40篇个人诗篇的存在得到证明，这些诗篇专门在个人危机之中向神呼求，如疾病、罪咎或罪恶，乃至仇敌的压迫。[35]它们还包含直接向神陈述的个人感恩，发出哀叹或苦楚，呼求神的介入，随后以信仰的见证或为蒙拯救而感恩作结。这种个人祷告的基本根基植根于早期大卫诗篇传统，该传统其后经历了更广泛的汇编过程。另一方面，诗篇也经过群体性的编修；那些个人经历被编修者联合成一个内在与外在兼具的双重框架，涵盖诗篇1–150篇，成为一个整体的颂赞单元。这是为全体会众赞美神的指南。《诗篇》的五部分结构，以诗篇41、72、89、106与150篇的颂赞作结，表明个人的哀歌最终指向成为共同的、普世的赞美，其高潮见于诗篇146–150篇。通过群体性的编修，包括将称谓YHWH改为Elohim的*Elohistic*（伊罗欣典）编修过程，诗篇成为命令式的颂歌，也成为参与式的颂歌，使神的子民在祂面前共同发出信仰之声。

哀歌：诚实信仰的语言

哀歌常被视为一种出自深渊的祷告，而将赞美视为整个信仰历程的高潮顶点。然而，哀歌并非仅仅是赞美的对立面，因为它具有可以独立存在的神学功能。诗篇表明，哀歌是信仰最诚实的语言，是神的子民放下伪饰、带着自己的伤痕、愤怒与困惑来到主面前的一种祷告形式。诗篇150:6亦有同样的表述：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150:6）[36]

哀歌具体表明，诗篇之所以是第二部妥拉，并非因为它取代妥拉，而是因为它通过祷告、哀歌、赞美以及对主之道的默想来塑造子民的灵性。“第二部妥拉”这一说法是现代神学的隐喻，由布雷瓦德·S·蔡尔兹（Brevard S. Childs）、杰拉尔德·H·威尔逊（Gerald H. Wilson）和戈登·温汉姆（Gordon Wenham）等正典进路的学者所提出并加以支持。在结构上，诗篇被刻意编排为五卷，与摩西五经相仿（诗1–41；42–72；73–89；90–106；107–150），就此而言，它是神的子民生活的权威指引。所不同的是，妥拉以律法和叙事言说，而诗篇则以祷告、诗歌和哀歌言说，后者成为与神之间动态关系的典范。作为第二部妥拉的诗篇不仅仅是关于苦难的教导；它赋予神的子民抱怨、发问、甚至与主角力的正当性。若这是一种摆脱虚假虔诚的诚实祷告，那么哀歌便成为在神面前的一种信仰抗议。哀歌恰恰教导我们，神的子民被赐予一种正当的语言，

[34]Rullyanty M. Tulende, *Kajian Terhadap Kitab Mazmur 52:1-10 Dalam Upaya Berteologi Kontekstual Tentang Pohon Zaitun dan Relevansinya Dengan Pohon Pala di Pulau Siau*, 25 April 202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1064087.

[35]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36]*Perjanjian Lama*.

可以抱怨、发问，甚至与主角力。这是诚实之人的祷告，没有虚假虔诚的面具。这使诗篇向我们表明，我们为何应当惊叹于那位邀请并接纳我们的抱怨、拥抱一切出自受伤之心的疑问的主。诗篇40篇是一个完美的例子。第1–10节表达对所蒙帮助的感恩，而第11–17节则是包含祈求保护的哀歌。这一结构显示了同一首诗中哀歌与赞美之间的转换，却并未消除神学上的张力。这正表明，在灵性上，哀歌诗与赞美诗可以在同一祷告中并肩而行、动态共存，亦即动态地并存，却不被视为彼此矛盾。

此外，诗篇中的哀歌具有抵制只追求得胜的灵性的功能。将哀歌纳入崇拜，意味着教会为受苦的会众提供一个得以恢复的空间。哀歌成为一种礼仪性的疗愈，它承认苦难的现实，却不丧失盼望。诗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编修过程，其中它仿佛以诗体写成，是一种出自希伯来语的诗歌，据信是以平行体的技巧写成的。[37]平行体是指一个短语之后跟随第二个短语，后者重复、补充，甚至对照前一个短语，例如诗篇38:19所见。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38]

这里，它被描述为一种重复的形式，而比较的过程也出现在诗篇1: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惟有恶人的道路必致灭亡。”[39]

这似乎指向弥赛亚的盼望。

诗篇所含的神学也涉及哀歌。就整体而言，诗篇所言说的是雅威信仰，其中包含旧约的神学人类学，并且似乎曾被路德（M. Luther）视为正典，他将其比作一本小书。[40]诗篇被视为以色列对主所赐妥拉的回应。其中所含的神学，例如，神在历史之中个别地行事，又如神虽然超越，却作为创造主，通过旷野中的解放与保护的历史而行事。其次，它仿佛是为信仰生活而设的妥拉，因为诗篇被认为在理论上具有这样的功能，即引导神的子民通过祷告、哀歌、赞美和信仰的默想来活出妥拉，其中成功的生活是与神同在而活时所得到的；相反，没有神，生活就会成为失败。[41]

还有一种神学表明，人在神面前虽然脆弱，却被赋予神所赐的荣耀，如诗篇8篇所描绘的，既有圣洁的神，也有作为罪人群体的人类。接下来是祷告，它成为我们得以兴盛的途径，其重点在于祷告不仅是仪式，更是兴盛生活背后的根本部分。通过个人与群体的哀歌所展现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表达了无助与焦虑，随后是恳求与盼

[37]Robert Lowth, *Robert Lowth (1r710-1787): The Major Works ; [8 Volumes]*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38]*Perjanjian Lama*.

[39]*Perjanjian Lama*.

[40]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35: Word and Sacrament: 1*, American ed, ed. oleh Jaroslav Pelikan dan Helmut T. Lehmann (Concordia Publ. House [u.a.], 1960).

[41]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望，并继之以祷告的目的，即成为使人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合一的途径。哀歌同样具有抵制只追求得胜的灵性的功能。若取消哀歌，教会将塑造出肤浅的信仰。诗篇也为受苦的会众提供一个得以恢复的空间，使哀歌成为承认苦难现实而不丧失盼望的礼仪性疗愈。接下来的神学价值涉及诗篇的特殊性（*particularism*），其中包含以色列整体为万国所献上的首要祷告，使神得着荣耀。

作为神学高潮的赞美

诗篇150篇是作结的颂赞，被编排为一个普世的呼召。赞美不再局限于圣殿或以色列民族，而是涉及全部受造之物，正如“凡有气息的”这一表述所言。这表明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呼召普遍地赞美主。随后是锡安神学，其中包含安全之所、万国所归之处，以及神建立和平之所在。最后，还有显明末世论的价值，它借着诸如“愿你的国降临”这样的祷告呼求，成为等候神的国的途径，其中锡安成为指向圆满成就的盼望的象征。[42]因此，就整体而言，诗篇所含的神学价值是一种祷告的神学，它成为在神面前过真实生活的途径，这生活有哀歌、赞美、感恩和盼望，并伴随着对神的国得以成全的等候。锡安是圣所，在那里，耶和华（*Adonai*）是拯救人脱离灾难之处，这地方有一天将属于万国；这使它成为耶和华（*Adonai*）成就和平的途径。

对教会的神学与礼仪启示

将诗篇理解为歌唱的第二部妥拉，对当今教会的信仰与礼仪具有启示。首先，在神学上，教会蒙召不仅要把诗篇当作供人阅读的文本，更要当作活出来的祷告。若妥拉教导以律法为生活之道，那么诗篇则教导祷告、哀歌与赞美乃是真实信仰的气息。教会需要自我纠正，使哀歌作为礼仪得以恢复；恢复诗篇的完整使用，尤其是哀歌诗和咒诅诗，可以引领会众在神面前达到灵性上的诚实。在日常崇拜、个人祷告和群体庆典中使用诗篇，将形成一种植根于神的子民历世历代挣扎之中的灵性。诗篇不仅是诗歌，也是信仰的学校，子民在其中学习在喜乐与悲伤中、在确信与怀疑中祷告，并伴随着对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的等候。

教会无需惧怕哀歌；相反，哀歌将成为信仰得以受试验并加深的空间。教会的礼仪也需要设计这样的崇拜，让会众有余地向神直接倾诉自己的哀伤、怀疑与愤怒，正如诗篇40篇所示范的。此外，诗人教导我们，赞美不仅是逃避苦难的一种方式，而是信仰历程穿越幽暗之谷、迈向末世盼望的高潮。教会应当勇于歌唱哀歌诗篇，而不仅仅是赞美诗篇；如此，会众将发现，圣经的信仰从不假装快乐，而是持续经历挣扎并仍然相信。诗篇将神的子民塑造成这样一个群体：在主面前诚实，在苦难中忠心，并渴慕他即将来临的国度。

[42]Jan Christian Gertz, *Purwa Pustaka*.

结论

诗篇是一部希伯来诗歌集，经由跨越历代的漫长编修过程而成，大卫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但并非唯一的作者。其所含的神学体现于祷告之中，祷告成为表达信仰的独特媒介，其中神对人是位格性的，因此脆弱与荣耀都在他面前显明。诗篇不仅是对妥拉的回应，而且本身就是妥拉，它成为信徒生活的指引，用以确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即神的旨意。本书也将以色列的特殊意识与荣耀神之名的普世呼召结合起来。最终，它指向末世的盼望，以及借着作为和平中心的锡安这一象征而建立神的国。诗篇是一部希伯来诗歌集。据此，将*mizmor*（מִזְמוֹר）一词的词根理解为以拨弦乐器伴奏的诗歌，将*tehillah*（תְּהִלָּה）理解为赞美的呼喊，便确认诗篇不仅是文本，更是活生生的礼仪事件。如诗篇40篇与150篇所示，诚实的哀歌与普世的赞美之间的张力表明，真实的信仰绝非静止，而总是在挣扎与盼望中前行。因此，诗篇堪称“歌唱的第二部妥拉”，因为它引导神的子民在信仰经验的一个完整统一体中祷告、哀歌与赞美。

参考文献

ADDIN ZOTERO_BIBL {"uncited":[],"omitted":[],"custom":[]} CSL_BIBLIOGRAPHY Blommendaal, J., dan P. S. Naipospos. *Pengantar kepada perjanjian lama*. Cet. ke-2. Gunung Mulia, 1983.

Bonhoeffer, Dietrich. *Psalms: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 1st ed. With Walter Brueggemann.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2022.

Botha, Philippus J. “Interpreting ‘Torah’ in Psalm 1 in the light of Psalm 119.”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68, no. 1 (2012): 7 pages. https://doi.org/10.4102/hts.v68i1.1274.

Childs, Brevard 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1st American ed. Fortress Press, 1979.

DeClaissé-Walford, Nancy L. *Introduction to the Psalms: a song from ancient Israel*. Chalice Press, 2004.

Hurvitz, Avi, Leeor Gottlieb, Aaron D. Hornkohl, dan Emmanuel Mastéy. *A concise lexicon of late biblical Hebrew: linguistic innova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Supplements to Vetus Testamentum, volume 160. Brill, 2014.

Jan Christian Gertz, Angelika Berlejung. *Purwa Pustaka*. 1 ed. 1. BPK Gunung Mulia, 2017.

Jankowitz, Hendrika J., dan Daleen Kruger. “Die stand van psalmsang in die NG Kerk.” *Verbum et Ecclesia* 31, no. 1 (2010): 10 pages. https://doi.org/10.4102/ve.v31i1.400.

Lasor, W. S., D. A. Hubbard, dan F. W. Bush. *Pengantar Perjanjian Lama 2*. Vol. 13. 13 10002011999.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13 ed. BPK Gunung Mulia, 2011.

Longman, Tremper, dan Raymond Bryan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2. ed. Zondervan, 2007.

Lowth, Robert. *Robert Lowth (1710-1787): The Major Works ; [8 Volumes]*.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Luther, Martin. *Luther's Works. 35: Word and Sacrament: 1*. American ed. Disunting oleh Jaroslav Pelikan dan Helmut T. Lehmann. Concordia Publ. House [u.a.], 1960.

Miller, Robert D. *The psalms as Israel's prayer and our own*. Christian heritage rediscovered 2. Christian World Imprints, 2013.

Perjanjian Lama: Ibrani - Indonesia. Lembaga Alkitab Indonesia, 2004.

Puling, Isak Petrus, Abraham Bt, dan Malik Bambangan. "Mazmur sebagai Doa dan Pujian: Tafsir Teologis terhadap Dinamika Emosi dalam Kitab Mazmur 146-150." *Jurnal Riset Rumpun Agama dan Filsafat* 4, no. 2 (2025): 132–45. https://doi.org/10.55606/jurrafi.v4i2.5083.

Rullyanty M. Tulende. *Kajian Terhadap Kitab Mazmur 52:1-10 Dalam Upaya Berteologi Kontekstual Tentang Pohon Zaitun dan Relevansinya Dengan Pohon Pala di Pulau Siau*. 25 April 2024.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1064087.

Soggin, J. Alberto.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Closing of the Alexandrian Canon*. Rev. ed.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Westminster Press, 1980.

Subiyanto, Paulus, Ida Bagus Putra Yadnya, Aron Meko Mbete, dan Frans Made Brata. "Conceptualization of God in the Book of Psalm: A Study of Metaphor 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s Research* 5, no. 1 (2019): 46. https://doi.org/10.5296/elr.v5i1.14594.

The Writings: = Ketuvim.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According to the Masoretic Text, 3rd section.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2.

Waltke, Bruce K. *The Psalms as Christian lamen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Webb, Philip. "A Defense of Psalms Singing: Solutions to Contemporary Practic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ies, 2023. https://doi.org/10.13023/ETD.2023.354.

Wilson, Gerald H. "The Shape of the Book of Psalms."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46, no. 2 (1992): 129–42. https://doi.org/10.1177/002096439204600203.